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 孙修身著 .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ISBN 7 - 5423 - 0936 - 6

I . 敦... II . 孙... III . 中外关系—交通运输—研究—敦煌 (历史地名) —古代 IV . F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6436 号

责任编辑: 薛英昭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王保华

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

孙修身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0 号)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60 千

1999 年 月第 1 版 1999 年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00

ISBN 7 - 5423 - 0936 - 6 K·51 定价: 元

# 序 言

敦煌位于我国西北，河西走廊的西端，原为羌戎所居。在秦汉之际，匈奴人赶走原居敦煌的大月氏人而占有河西，并成为汉西北边境的严重威胁。

到西汉武帝时，汉朝的国势日强，国家富足，军事强大，汉武帝改变其父祖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对匈奴由军事防御转入军事进攻。经过三次著名的战役，匈奴折翅伤翼，失败已成定局。

在汉武帝对匈奴的战役里，对敦煌历史发展最具影响者，是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之役。霍去病受命率军攻击河西地区，彻底打败了匈奴军，占据了河西走廊，列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把秦时所修的长城，延长至于敦煌，隔断了胡与羌的联系。从此敦煌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更好地对匈奴作战，汉武帝曾经两次派遣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了我国和西域诸国间的正式交通。张骞“凿空”的中西交通孔道，就是今人所说的“丝绸之路”。敦煌亦成为“丝绸之路”上



的重镇。

佛教在“丝绸之路”开通后，沿着此道东传于我国。敦煌在这里最先接待了这一域外宗教。经过翻译、消化、吸收和融合，佛教传于内地，最终成为中国人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广为传播开来。敦煌莫高窟这座世界著名的佛教艺术殿堂，亦应运在敦煌降生。

据敦煌现存碑铭和敦煌文献的记载可知，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和尚西游至此，见三危山金光万道，状若千佛之奇，以为此为修道之圣所，于是开凿了一个洞窟，既而法良禅师开凿了第二窟，拉开了敦煌莫高窟发展史的序幕。此后，经过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上下千年的相继修凿，形成了一座光耀世界的佛教艺术殿堂。

敦煌莫高窟坐落在三危和鸣沙两山间的谷地里，南北长1016米，现存有各个时期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余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唐宋等时期所建的窟檐多座，以其丰富多彩的佛教艺术，受到国内外学人的普遍赞誉，并有许多人为之倾倒。在当今世界上，有诸多的学者、专家从事着有关敦煌莫高窟的研究工作，并因之形成了一门学科——敦煌学，许多国家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足见其影响之大。

在当今敦煌学的研究之中，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亦冒昧地说一句，当前的研究还停留在敦煌佛教艺术和敦煌文献研究的初始时期，是着



眼于具体事情和内容的研究，深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

本书的撰写，利用敦煌文物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对于敦煌在古代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试作讨论。由于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在行文之中将有许多新的看法提出，并有必要的考证。

全书的主旨意在说明，敦煌不仅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总管中西交通诸道，如于阗道、龟兹道，而且还有和唐蕃交通直接相关的、敦煌陷蕃时期敦煌向吐蕃上贡香梨的交通道路。书中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吸收，对于一些与前人不同的看法，亦以史实为据，进行新的辨析。如对唐使奉旨出使印度、玄照法师求法印度的行经路线等等，都进行了新的考证与讨论，证明它是沿古丝绸之路，再经 宾道和吐蕃西南的“麝香之路”。麝香之路和人们常说的泥婆罗道相接，到达了印度摩揭陀王国。这和传统的说法——谓其沿唐蕃故道以达印度的说法截然不同。而这个结论的取得，除了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外，更为重要的是依据了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提供给我们的图像资料。这亦是我們利用敦煌资料研究历史的新尝试。既然是尝试，错误便在所难免，不当之处敬请大家不吝指教。

在此书中吸收了刘迎胜、张云先生的一些成果，为避免掠人之美的嫌疑，在此特作说明，并向他们致以谢意。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孙修身

1999年5月18日于兰州

# 目 录



序言 .....	1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命名及内涵 .....	1
第二章 丝绸之路的开通及河西文化圈 的形成 .....	7
第三章 “四主”之说 .....	21
第四章 象王国印度 .....	24
第五章 唐和印度属国的友谊 .....	29
第一节 唐和泥婆罗国的友好往来 .....	29
第二节 唐和迦摩缕波国的交通 .....	46
第六章 唐与马主突厥的关系 .....	55
第七章 唐蕃古道 .....	60
第一节 吐蕃政权建立前的西藏 .....	60
第二节 吐蕃王朝的建立 .....	68
第三节 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 .....	78
第四节 唐蕃古道上的行人 .....	99
第五节 吐蕃境内的主要交通道路	



.....	109
第八章 丝绸之路上的行人 .....	130
第一节 中国最早的译经僧安世高 .....	130
第二节 东晋高僧法显和《佛国记》 .....	134
第三节 从凡夫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刘 萨诃 .....	160
第四节 班超、班勇在西域 .....	168
第五节 建功异域的唐朝敕使王玄策 .....	172
第九章 中印文化、科技的交流 .....	179
第一节 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交流 ...	179
第二节 印度医学对中国的影响 ...	182
第三节 印度制糖法的传来 .....	185
第四节 印度七曜历法的传来 .....	186

# 第一章

## 丝绸之路的命名及内涵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首先是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公元1833年~公元1905年）在他所著的三卷本的《中国》里提出的。在该书中，将往返于西域的骆驼商路称之为“丝绸之路”。1910年赫尔曼在其所撰著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路》一书里，进一步确立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概念和内涵。这一名称的使用，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古时中西文化和经济交流的肯定。它生动地告诉我们：古代中国和西方的交通，是以丝绸之路作为中间媒介的。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李希霍芬和赫尔曼等人所言的“丝绸之路”，仅指我国和西域诸国交往的陆上交通道路，我们可以称之为狭义的“丝绸之路”。今天人们习惯将古代中国和西方的交通道路，通通称为“丝绸之路”。于是在世人的研究论著里开始出现了诸多的不同的“丝绸之路”的名称，如“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吐蕃丝绸之路”等。浙江人民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一套“丝路文化丛书”，分为《沙漠卷》（黄新亚著）、《西南卷》（邓廷良著）、《吐蕃卷》（张云著）、《海上卷》（刘迎胜著）、《草原卷》（刘迎胜著）。这套丛书详尽地介绍了各种“丝绸之路”。我们将这种内涵扩大了“丝绸之路”，称为广义的“丝绸之路”。

养蚕和织丝工艺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关于养蚕技术的发明，中国的汉文记载，都将其追述至传说时期的黄帝的妃子螺



祖。螺祖为何部落、何地之人？《华阳国志·蜀志》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国同囿。”这里将其推至中国历史传说时代的“人皇”时期。这是有关巴国立国时间的传说。在《大载祀记·帝系篇》说到了黄帝妃螺祖，其谓：“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螺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 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意濮，产颡顛。”《山海经·海内经》中亦说：“黄帝娶雷祖（螺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娶淖（蜀）子，曰阿女，生颡顛。”除此之外，在《吕氏春秋·古乐篇》、《史记·五帝本纪》诸书之中，亦有着相近的记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汉书·地理志》中，向我们介绍了颡顛所居处的若水，即今四川省甘孜地区的雅砻江。由是使我们不仅判定了蜀山氏是和黄帝同时存在的部落，亦使我们判定黄帝部落亦是当时活动于岷山地区的部落。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诸少孙的《三王世家》、司马贞的《史记索引》及《华阳国志》诸书，都说颡顛是黄帝的后裔。

在古代相邻的部落之间，为了加强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大抵都是世代联姻的。因此产生了黄帝妃螺祖亦是蜀山氏之女的传说。还有文献记载称，蜀王第一代族名蚕丛氏。而“蜀”字本为“野蚕”之意。许慎《说文解字》里，解释“蜀”字云：“蜀，葵中蚕也。”蜀人素以善织而闻名于世。在我国秦汉时期，蜀布和丝绸早已传遍中外。相传曰，在蚕丛氏时代，蜀地已有初期的集市贸易，亦即“蚕市”。由是我们可以知道，蜀地是养蚕和生产丝绸的故乡，属于蜀族的螺祖，被人们奉为养蚕业的创始人，亦是极为自然的。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养蚕业的创始人螺祖，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当为创造和从事此业的部落或者部族。神话和传说故事的创作，是需要主人公的，而五帝之一的黄帝和他的妃子，则成为最好的人选，于是一个部族集体创造的成果，则被附会在黄帝妃子螺祖的身上。螺祖是经过人们加



工而创造出来的神话人物，并非实有。在传说中她是以马首人身的形象出现的，后世的养蚕之家将其称为马头娘娘，世代供养着。她实为古代蜀族之中以马为图腾的一支所创始的神话人物。

养蚕技术发明的时间，史无明载，所以我们要确定它的具体时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从“西陵氏劝蚕稼”一语中，我们可以确定其发明于人类社会从游牧生活转向农业定居生活的时期，大致可定位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

随着解放后考古事业的发展，出土了许多实物，为我们前面的推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吴兴县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的发掘中，在该处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丝带、丝线和残绢等早期的丝织物。经过科学鉴定，初步认为它是蚕丝织物。这就清楚地向我们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们已经开始从事养蚕和织丝等生产活动。这和黄帝妃子螺祖发明养蚕的传说是相合的。到了殷商时期，在我国出现了甲骨文字，我国历史的发展因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知道，在商代已经有桑树和丝帛的出现（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33页，董作宾《甲骨学商史稿》下册，向达《亚洲文化论丛》第46页）。在金文之中，同样有“丝”字的出现和存在，其形状有类于成束丝捆的模样（见《毛公鼎》和《品父盘》铭文）。197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市发掘和清理了一批古墓葬。这批古墓开始时被定为汉墓，后来又改定为魏晋墓。在其中发现有丝绸之物。在墓中的画像砖上面绘有童子驱鸟护桑图、采桑图等。在一座古墓之中的画像砖上，还绘有蚕茧、丝束、绢帛等。另外，在一些墓葬中绘有缫丝工具。所有这些都客观地向我们说明，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养蚕和丝织业已经成为人们家庭中的重要副业生产活动。在驰名中外的马王堆汉墓中，更有大量丝织物的发现与出土。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鱼儿沟古墓的考



古发掘中，出土了属于我国战国时期的具有凤纹图案的刺绣品（《新疆考古三十年》图版 44）。在昭苏县木扎特（夏台）还出土有汉代的茧形壶（《新疆考古三十年》图版 56）。更为重要的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脱库孜萨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引人瞩目的蚕茧和丝的实物资料（《新疆考古三十年》图版 143）。在乌鲁木齐鱼儿沟还发现有菱纹罗印痕（《新疆考古三十年》，时间为春秋战国时代。根据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概括：五帝时期，我国已有了养蚕业和织丝业。螺祖养蚕的时间，是我国开始人工养蚕，把野蚕变为家庭饲养的开始时间，亦是养蚕技术的发明时间。到我国历史上的殷商时期，养蚕业已成为家庭生产的重要内容，织丝业随之发展起来，丝织品亦成为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生活里极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珍贵物品。如《晋书·食货志》中载：“宫中，以锦绮为席。”这就是说，在很早的殷商时代，中国人不仅能养蚕，而且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丝织手工业，丝产品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统治者中已成为奢侈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之中，每当一种新的技术发明问世后，统治者总是将其视为至宝而加以保护，不肯将其法随便地外传给域外之人。自古至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统治者都是如此。在养蚕和丝织技术发明之后，中国的统治者亦是如此，力求保持养蚕和织丝的生产垄断地位。尽管统治者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力图保持此项技术的垄断地位，但其结果都是失败的，此项技术最终还是传到异国他乡，成为人们共同的财富。

诚如前面的讨论所及，在养蚕和织丝工艺技术发明之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曾经明令禁止这一工艺技术的外传。但是，并不说明他们不将丝绸产品作为赏赐之物或者商品远输到异国他乡。这已从各地的出土物和异国的历史文献中，获得了证明。丝绸的华美与漂亮，令人为之倾倒；它柔软、舒适的质感，使人难



以忘怀。但是，高昂的价钱又使一般人不敢问津。为了获得这种价等黄金的丝绸织物生产技术，外域之人想尽了方法。在中外的历史文献之中，有着许多蚕种外传的神奇传说故事。

在玄奘法师所撰的《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的记载中谓：“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蚕桑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新唐书·西域传上》卷二二一上记载：“（于阗国）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女刻石约无杀蚕，蛾飞尽得治茧。”

除上述汉文资料的记载外，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藏文写卷里，有《于阗国史》（被法国人伯希和劫往法国），书中亦有着和汉文记载相类的内容。其意为：国王毗耶耶娶中国公主哲捏霞，公主想把蚕种带到于阗去，于是就在麻杂这地方养了一些。中国大臣想从中破坏，告诉国王：蚕会变成毒蛇。国王听信了他的谗言，把蚕室放火烧掉。公主从中抢出了一些，用它缣出丝来，制成衣服，穿在身上。她后来把详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后很后悔。以上是我们在汉文和藏文文献中，检索到的有关中



国养蚕和织丝技术外传的，有趣而神奇的神话传说故事。

比较汉藏文献所记载的故事内容，就大旨上讲，应当说并无大的区别，但在具体的故事情节上则有着诸多的差异。比如在汉文文献中，没有讲明公主的姓名，而藏文资料则明确指出公主为哲捏霞；在汉文文献之中，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而藏文资料中却有具体、生动的故事情节。通过汉藏文献资料的比较，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此故事首先产生于汉地，是经过改造后传到藏地（当时的吐蕃）的。

蚕种是何时传到于阗的呢？由于史书中缺少有关的资料，所以很难确定其具体时间。对于此问题，我们只能依靠一些文献资料来间接解决。《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中谓：“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对于此段文字的看法是：“……这只是说，当地不产丝，并不是说，那里根本没有丝。丝是有的，不过是从中国内地传过去的。有名的横亘欧亚大陆的‘丝道’就通过西域。”（《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55页）季先生的这个看法是既客观，又符合实际的。事实上，西方许多国家的统治者都把丝织物当成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甚至在他们国家的法典之中，如《摩如法典》都列有关于丝织物管理方面的条文。所有这些都说明该地虽然已有丝织品的存在，但是还不能生产这种东西。当地的丝织物都是由中国输入的。如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鱼儿沟春秋时期的古墓之中，出土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刺绣和菱纹绢等。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物已经传到了西域诸多国家。这就是说，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蚕桑的养殖和丝织技术等等，都未传到外域。换句话说，桑蚕技术外传的时间，是绝对不会早于张骞通西域之年的。

## 第二章

# 丝绸之路的开通及 河西文化圈的形成

尽管丝绸之路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不知不觉地存在了上千年的时间，但是，真正具有完全意义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形成，则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

张骞（？～公元前 114 年），汉武帝时期人，汉中（今陕西城固）人。官至大行，封博望侯。汉武帝为了联合西域大月氏，展开对匈奴入侵的反击，派张骞出使西域。他率领使团翻越葱岭，途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西域国家。张骞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离开长安上路，中间被匈奴扣留长达 11 年之久，至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 年）方才还归西汉首都长安。他这次出使，虽然未能完成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的任务，但却对西域诸国情况有了较详细的了解。

匈奴族，原是活动于我国古代北方的重要的民族之一。也称胡。在我国的史书之中，有诸多名称：鬼方、混夷、獫狁、山戎。在秦汉时期称“匈奴”。散居于我国大漠南北，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善骑射。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封建王朝后，曾派遣将军蒙恬，将兵 32 万人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次年又越过黄河，夺取了匈奴所控制的高阙（今临河西北）、阴山（今临河县西北的狼山）、北假（今河套以北、大青山以西地区）等地。匈奴头曼（“曼”音“瞒”）单于在强秦的压力下，放



弃了河套地区及其统治中心头曼城，向北退却了七百余里。秦在匈奴退出的地方设置郡县，因河为塞，建立了 44 个县城，并把内地的居民迁移至于河套地区，进行屯垦，发展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秦还把原先秦、赵、燕诸国所建造的长城重新修整和连接起来。秦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省岷县），沿黄河北至于河套，傍阳山而至于辽东，绵延万里之地。蒙恬率军 32 万人，坐镇于上郡，以防匈奴南侵。但是，强秦灭亡后，国内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边防空虚，匈奴乘机南下，越过长城，重新夺取了被蒙恬攻占的河套和阴山等广大地区。匈奴还在阴山设立了一个制造弓箭的军事手工业基地。冒顿杀死了他的父亲，自立为单于后，匈奴势力变得更加强大。冒顿征服了许多部族和部落。他先破东胡族，进而西破月氏（原居河西敦煌、祁连间），南并楼烦、白羊，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等族，成为控地南起阴山、北达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到葱岭的大国。

从匈奴奴隶主政权建立时起，就不断地对中原王朝发起频繁的掠夺战争。匈奴利用楚汉相争、中原混战、无暇北顾之时，入侵燕代（今河北省北部），继而与汉军对峙于河套以南的嶂塞，甚至骚扰朝那（今甘肃省平凉市）、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市）。

西汉王朝建立后，面对匈奴的入侵，汉高祖刘邦曾经出兵抗击。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知，在公元前 200 年，汉高祖率军主动出击匈奴，但是不幸失败，被围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面）后用陈平之计乃得脱身。此后，双方签订了和亲盟约。匈奴通过和亲，每年从汉朝获得大量的絮、缯、酒、米等衣食。但是匈奴仍然不断地派兵南下，骚扰汉朝边境，杀戮吏民，掳掠人口。由于汉朝初建，无力反击，只有忍让。

在西汉建国的六七十年间，匈奴势力变得日益强大，史称其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匈奴贵族为了满足其贵族无限的贪欲，对汉朝边境的侵扰日甚。在公元前 201 年～公元前 133 年间，匈



匈奴骑兵连年南下，掳掠人畜，劫夺财物，践踏庄稼，汉朝北方广大地区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数十年中，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特别是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势变得十分强盛。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时，对匈奴进行反击的条件已经成熟。汉武帝废除了和亲政策，制定了以武力防御和抗击匈奴侵扰的方针。为了抗击匈奴，他任命卫青和霍去病为主将。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知，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战役，主要有如下三次：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河南（河套以南）战役；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在这三次战役中，汉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匈奴失败后，居其右地（河西走廊）的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归附西汉王朝，单于及其左贤王也都远逃。西汉王朝占领河西走廊后，在其地设置了有名的“河西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这为西汉王朝和西方诸国的交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为了保证西汉王朝对河西走廊这一地区的有效统治，西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措施：一是设立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即列四郡以统之；二是保卫河西走廊的安全。汉武帝先将秦时所建长城向西延伸至于令居（今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后再将其延伸至于酒泉，并最终将其延伸至于今敦煌市治域之中，并在那里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两个通往西域的关门。在沿长城诸地汉政府还建立起有效的烽燧管理制度，按照白天和晚上的不同，采取各种通报信息的措施，如在白天有来敌举烟，晚上则点火；按照来敌的方向、人数燃苜以通知长城沿线各烽和军事管理机构，让其及时地做好防御工作。各燧统管于都尉之下。各燧都有雄厚的物质储备，设有专门的军事仓库，统一支配和发放军用物资。在敦煌西面的大方盘城（亦名河仓城），即有当时储存粮秣和军械的库房。在甘肃省酒泉地区额济纳旗的居延遗址，发现有《塞上令品约》，涉及各军用物资的发放制度及管理方法等内容，



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有所谓“断匈奴右臂”，隔断胡（匈奴）与羌联系的记载。开始，我们对于这些话是很难理解的。近些年来，经过我国考古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在今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治域里，发现了南长城建筑的遗迹。南、北长城在甘肃省敦煌市治域西面相接，形成一个弧形的包围圈，将河西走廊全部包括在其中，着实起到隔断胡与羌联系、“断匈奴右臂”的作用。

由于西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牢固占有，原在河西走廊的匈奴诸族的迁徙，河西地区一时变得人烟稀少。为了牢固地巩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汉武帝采用徙民实边的政策，将诸多关东贫苦居民或者罪犯迁徙于此，进行屯田和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据居延、敦煌诸地出土的汉简，我们可以看到有大多数移民来自荥阳、淮阳诸地。

河西走廊虽然年降雨量有限，但是它有祁连山终年积雪融化的雪水形成的一条河流，地下有着丰富的储水，所以水资源不缺乏，加之中原地区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来，因而在不长的时间之内，河西农业生产就得到了飞速发展。这就保证了移民和驻军生活的需用，河西因之也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商品粮基地。在中原地区发生饥荒和灾难时，河西还能调拨出大量的粮食支援中原灾区。居延汉简的简文生动地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于唐代。《太平广记》谓：“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唐代晚期，张议潮率军驱逐出吐蕃奴隶主在河西走廊的统治，归义军治下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敦煌文书云：“荷锄如云”，“家家都有十铠水，男耕女织不相失”。唐僖宗时，中原发生饥荒，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还将大量的储粮运往中原，供给中央王朝，帮助其渡过灾难时刻。



由于大量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亦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有力地促进了河西走廊地区生产和文化的发展。比如汉时济南移民崔不意，在其地教民耕田，以勤效得谷，使其居地的农业生产很快地发展起来，后该地被建设成县，名曰效谷县。汉武帝时，赵过发明的代田法等，首先在河西走廊地区得到推广，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汉时，许多朝廷命官被贬于河西地区。如在戾太子事件后，有许多官员被迫迁到河西地区。这些官员都是具有较高知识的文化人，他们的到来，带来了中原发达的汉文化，并成为当地的望族和大姓。如敦煌地区的翟姓，即是汉朝著名宰相翟方进的后裔。此族自汉至于隋、唐、五代、宋，前后上千年的时间，更是绵绵不衰。敦煌莫高窟初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开凿而成的第200窟，即为翟氏的家庙窟。窟中壁画的精绝，为世人所称赞。更为我们所注意的是，此窟在晚唐、五代、宋时，曾经经过多次的重新修复，而每次的修复都未改变其姓氏。在其南壁发现的小龕中，还有晚唐时期的墨书《检家谱》的题记一方，其文为：“大成元年己亥岁□□迁于三 □□ 镌龕□□□ 圣容立□（像）唐任朝议郎敦煌司仓参军□□子翟通乡贡明经授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复于两大像中□造龕窟一所庄严素质图写尊容至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壬戌岁杂即此窟是也……九代曾孙节度□□□守随军参谋兼侍御史翟奉达检家谱。”它向我们说明了该窟室私人占有的性质。又从该窟供养人题名可见，翟姓始终是当地的大姓，世代在当地为官为宦，经久而不衰。从敦煌遗书中所见资料可知，这个家族历代在当地负责日历的编制工作。

敦煌李氏的郡望为陇西。此家族是在北周时期迁入敦煌居住的。此家族在隋朝时期，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遭到沉重打击，家族的许多成员被流放于西域的碎叶。唐朝初年赦还后，再居于敦煌，成为当地著名的大家族。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认为唐朝著